

文化差异导致身份政治冲突？

——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及其引发的理论反思*

王晓玲

内容提要：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论主要反映的是欧美的文化视角，认为人具有“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这种激情会以文化族群为单位得到表达，因而产生了基于文化差异的身份政治冲突。身份政治理论在文化差异和身份政治冲突之间画出了一条因果链条。韩国是单一文化族群国家，却也出现了身份政治冲突现象。韩国的政治家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身份政治集团——“情理阵营”，其最初是选举工具，继而成为跨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文化部落”。韩国社会虽对于“情理阵营”持批判态度，但受制于冷战思维、财阀垄断的经济体制，韩国不存在能有效改善贫富分化的政党，选民被动接受了身份政治。在韩国的案例中，文化是导致冲突的中间变量，真正的自变量是竞争性政党。该案例说明，包括文化冲突论在内的诸多身份政治理论有待于通过更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去检验。

关键词：身份政治 文化冲突论 单一文化族群 竞争性政党

作者简介：王晓玲，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论主要反映的是欧美的文化视角，相关讨论在文化差异和身份政治冲突之间画了一条因果链条。但韩国作为一个单一文化族群国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深化稳定周边国家关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批准号：22AZD107）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韩人文交流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6001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当代亚太》2023年第6期，第61~84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却也走上了激烈对抗的身份政治的道路，足以引发我们对文化冲突论等既有身份政治理论的怀疑。

一、理论回顾与本研究的出发点

综合国内外研究者对身份政治的阐述可见，身份政治是围绕文化身份的表达、认同和相互承认所展开的政治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实践。所谓的文化身份并非个人层面的，而是主要以某种文化族群为单位。倡导身份政治的左翼学者认为，身份政治是边缘文化族群获得文化解放的道路；社群主义学者关注多元文化政策如何能成功；保守主义学者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身份政治展开批判，前者认为，多元文化间的相互尊重难以实现，后者则认为，身份政治无视收入两极分化现象，是伪政治。^① 本研究在理论回顾部分主要关注身份政治理论对于文化间冲突发生机制的理解，以及这些话语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这同时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一）身份政治理论中的文化冲突视角

有关身份政治的讨论主要在欧美历史文化视域下展开，其源起可被追溯至欧洲思想家们自古以来所一直关注的人的“激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柏拉图所说的“血气”、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对荣耀的欲望”、霍布斯所说的“骄傲或虚荣”、卢梭所说的“自尊”、汉密尔顿所说的“对声名的爱”、黑格尔所说的“承认”、尼采所说的“红面野兽”等，都在描述人的“激情”。^② “激情”成为在“效用最大化”之外解释人的行为动机的又一条路径。

“激情”在古代曾经是贵族的优越感，进入现代社会后，优越激情逐渐

^① 相关研究参见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恩佐·波伦科：《多元文化主义：西方社会有关多元文化的争论概述》，郭莲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4期，第1~15页。

^②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页。

被平等激情取代。^① 现代化转型对欧洲人而言意味着告别神的统治,同时每个人都因此开始面临“意义危机”。现代化转型还意味着身份制度的终结,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平等承认。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只有在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② 人终将走向相互承认,但承认发生在殊死斗争之后。人在寻找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会遭遇社会规习与内在自我的不匹配,从而为承认而斗争。为承认而斗争是驱动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③ 黑格尔又指出,自我意识以“我”与“他人”的互动为前提,是在共同体中形成的,经过了中介的主体间性。^④ 引入主体间性概念后,为承认而斗争的个人又能够重新走向社会团结,这种社会团结不必以每个人的道德直觉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历史实践和理性的基础之上。“为承认而斗争”和“主体间性”为20世纪身份政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把身份政治理论根植于一种充满张力、动荡冲突的文化心理中。

追求承认的道路有两条,其一是以人的同一性为基础,作为个体被平等承认;其二是从文化特殊性出发,作为某个文化族群的一员得到承认,而身份政治走向了后者。在这个路口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社群主义学者起了重要作用。泰勒认为,人都生活在某种文化共同体里,人的自我认同存在于对话中,内嵌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之内。^⑤ 因此,在现实政治中,人是作为某个文化族群中的一员被承认的。

以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则重拾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话题,号召人们追求“文化解放”。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等人把身份政治构建成一个与分配政治相对的概念。^⑥ 与马克思所认为的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经济关系,文化承认的问题从属于经济关

①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25~26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0~121页。

③ 同上,第155页。

④ 同上,第117~118页。

⑤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6.

⑥ 南茜·弗雷泽在她与阿克塞尔·霍耐特共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一书中,列举了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围绕身份政治话题出版的四部著作,这四部著作都围绕分配正义与承认正义的比较展开论述,由此得出正文中结论。相关论述参见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第6~10页。

系的观点不同,^① 霍耐特认为,“承认”是统摄性的道德范畴,分配正义是身份认同的派生物,消除“错误承认”的身份政治才是人类走向解放的终极路径。^② 他归纳了三种形式的承认——爱、权利和团结,分别对应“情感承认”“法律承认”和“社会团结”,认为人会因此产生自信、自尊和自豪感。^③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错误的身份认同与不公正的经济分配在实践中互为因果、密不可分,需要同时消除这两者才能增进社会正义。她构建了一个包括承认、分配和代表权在内的三维理论框架,希望以此同时纠正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④ 换言之,身份政治追求“被承认”,这不仅仅代表对某种文化传统的尊重,同时还要求通过立法对社会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甚至是补偿性的公平分配。在泰勒和霍耐特之后,身份政治成为少数文化族群追求公平承认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充满文化冲突的张力——人们可能主张自己属于更小更特殊的文化族群,文化的分化没有固定边界;当人们主张自己属于某种文化族群时,文化就会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藩篱;不同文化族群即便能够走向相互承认,也需要经历斗争。对此,霍耐特和泰勒都相信现代社会拥有走向妥协的理性,以及容纳文化差异的道德共识。

但是,保守主义学者对文化之间的冲突持悲观态度。在外来文化族群占比迅速增加、部分族群拒绝融入欧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贝特·叶奥(Bat Ye'or)等人纷纷发声,表达了欧美主流文化对外来移民文化的深切忧虑。^⑤ 保守主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政策只会有利于偏狭的、反现代的、反民主的少数群体,少数群体还会将多数群体斥责为种族主义者。^⑥ 而早在关注美国内部的文化冲突之前,亨廷顿已经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表达了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或不可避免的观点。这本书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热议。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200页。

② 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第8页。

③ 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第126~181页。

④ 南茜·弗雷泽:《重构全球化世界中的正义》,载凯文·奥尔森编:《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高静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279页。

⑤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Bat Ye'or, *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 British Columbia: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⑥ 恩佐·波伦科:《多元文化主义:西方社会有关多元文化的争论概述》,第8~9页。

福山的态度虽然比保守主义学者乐观,但也对多元文化融合充满担忧。他指出,文化身份源自每个群体独特的生活体验。生活体验无法与他者共享,因此也就形成了他者无法进入的文化身份。^①

左翼学者把表述文化差异、进而为承认而斗争视为多元文化族群走向相互承认的必由之路。保守主义学者认为,强调差异的结果是排斥和对抗。这两种观点都在文化差异和身份政治对抗之间画出了因果链。

(二) 走向文化冲突的身份政治实践

现实情况是,不同文化族群间的身份政治冲突现象日益突出。20世纪后半期,欧美的左翼政党从关注经济平等转向关注边缘文化族群,一系列多元文化政策出台,身份政治改善了边缘文化族群的社会地位。但是进入21世纪,尤其第二个10年,如何化解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成为身份政治面临的难题。欧美主流文化族群抱怨边缘文化族群得到了特权,保守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形成对峙。在欧洲,难民问题引发了社会撕裂和国家间分歧,英国经历全民公投后正式脱欧。美国则爆发了“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特朗普在美墨边境线上筑起高墙。

2000年后,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宣布多元文化主义相关政策失败。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全球范围内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或者宗教色彩的领导人的人数增加,这样的政党在各国国内也得到了更多的议席。面对日益激化的文化冲突,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推出一系列“文化处方”以加速文化融合与文化同化,具体包括:提高移民政策门槛;保护本国主流文化;引导多元文化主义尊重宪法的价值观;以交互文化主义修正多元文化主义,推动族群间的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通过构建公民的多重文化身份以塑造交融混杂的文化共同体。^②福山开出的“处方”是“信条国家”,即以现有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为基石,构建一种容纳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通过公民社会的同一性统合文化领域的多样性。^③这些文化融合、文化同化政策能否解决目前的身份政治对抗、是否会引发少数文化族群的反抗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冲突已经成为现实,文化差异导致身份政治对抗的观

①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108页。

② 刘兴澍:《交互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争——加拿大的案例分析》,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5期,第1~2页。

③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155~171页。

念正在指导欧美国家的政治实践。文化冲突的观念在今天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近日在意大利参加活动时很自然地谈到身份政治，并称之为“觉醒思想病毒”（woke mind virus）。马斯克警告说，“（欧洲）不应该从美国进口觉醒思想病毒，它会分裂民众，让人们互相仇恨”。^①

（三）本研究的出发点与意义

导致身份政治冲突的真的是文化差异吗？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人具有多重文化身份，文化/文明冲突论犯了简单抽象的错误，抽取群体的单一身份（如宗教、社群、种族等）作为构建理论的维度，推导出冲突源于文化或文明的错误结论，而这些所谓的理论很容易被政客或极端组织用来强化一群人的单一身份，并挑起冲突。^②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批评身份政治是“伪政治”时提到，文化主义是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部分知识左派为摆脱失语而做的一种努力。^③ 很多中国学者也提出，身份政治对抗的根源并非文化差异。如涂锋认为，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竞争性民主体制的内在缺陷导致了身份政治激进化和制度运行失灵。^④ 林红指出，在竞争性选举和政党政治的影响下，进步主义性质的身份政治成为功利主义的政党工具。^⑤ 上述讨论虽然质疑了文化差异与身份政治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缺乏有说服力的案例支撑。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把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纳入身份政治理论的视野，跳出欧美文化视域，重新审视身份政治的发展机制。韩国是一个复制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单一文化族群国家，其国内也出现了日益激烈的身份政治对抗，但问题的源头不在于文化，而是在于两大寡头政党在选举中塑造了身份政治集团。韩国的案例排除了原生文化族群差异这一变量，使原本被文化差异遮蔽的政党竞争的影响力充分显现。

① 《马斯克警告：别从美国进口这种“病毒”》，《环球时报》网站，2023年12月17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FnQbL17bJt>。

② Amartya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pp. 10-12, 40-42.

③ 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第6页。

④ 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51页。

⑤ 林红：《困于身份的政治：西方政治极化问题的文化探源》，载《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57页。

有关身份政治的既有研究很少关注韩国。韩国学者有关身份认同如何影响选举的研究成果非常多,^①他们反复证实了特定地域、世代、性别与政党偏好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指出选民投票与其阶层利益不符,具有“阶层背叛”的特点,^②但较少从身份政治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韩国政治。本研究关注选民阵营同时兼具社会文化认同与政治理念认同的特点,尝试提出“情理阵营”的概念,从身份政治理论入手描述韩国的政治文化,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韩国国内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走向,及其对韩国外交的影响。这是本研究的第二层意义。

二、韩国的社会文化特征

从个体文化心理层面看,韩国人个人自由主义倾向较弱,缺少“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从社会文化结构层面看,韩国是单一文化族群,历史上也未卷入过文化冲突。

(一) 不存在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文化心理

如前所述,欧美学者认为,身份政治的根源在于社会规习与内在自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促使人们为获得他人的承认而斗争。这种视角是从个体诉求出发,分析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继而解释社会整体发展机制,体现了原子论的思维模式。而历史上曾深刻影响韩国的中华文化持整体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出发点不是个体诉求,而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赵汀阳认为,对比西方,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都是主体间问题。孔子主张的仁是最早的主体间关系概念。主体间互动的功能是建立秩序,而儒家礼乐秩序的本质就是建立人际关系秩序。^③儒家认为,维护整体的长远利益是社会成员的道德追求,个人的人生价值要在共同体的发展中得以体现,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④相比欧美,中华文化中的“我”

①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 안문석, 『한국의 선거정치: 이념, 지역, 세대와 미디어』, 서울: 푸른길, 2003.

② 이재득, “20 대 대선 유권자들의 이념적 구성과 대선 후보 선호도: 세대 균열, 계급 배반, 그리고 양극화”, EAI 이슈브리핑, <https://www.eai.or.kr>, 2022년 1월 28일.

③ 赵汀阳:《关于跨文化和跨主体性的一个讨论》,载《思想战线》2023年第1期,第45页。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第7页。

是“我们”中的“我”，“我”与社会规习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弱化。在历史上，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韩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我们较少感受到欧洲学者所强调的那种“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自现代化转型以来，这一地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增长，但相比欧美仍然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特征。

很多研究都发现，韩国人的自我意识淡漠。有韩国学者指出，韩语尽量避免使用“我”，而是使用“我们”，如把“我爸爸”说成是“我们爸爸”。^①该学者对韩国人“什么情况下会看眼色行事”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排第一位的答案是“看眼色是为了与周围人保持一致”。^②在韩语中，“틀리다”是“不同”的意思，同时也是“错误”的意思。

某种程度上，儒家所主张的礼法秩序今天仍然规范着韩国人的日常行为。以长幼为基础的尊卑秩序内嵌于韩国人的语言中，既体现为“敬语—卑称”的语法，也体现为鞠躬等肢体语言。这一秩序时刻规范着韩国人的言行，把每个人置于固定的角色中，使生活场景中的很多共同体都具有“类家族”的特点。一项针对中韩大学生的对比调查研究显示，对于“儒家文化的本质”，中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学说”的占比最多，而韩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行为规范”的占比最多。对于“最重要的儒家价值观”，中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仁”的占比最多，而韩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孝”的占比最多。58%的韩国受访大学生与朋友的年龄差小于2岁。原因在于，当年龄差大于2岁，很多韩国人在谈话中会使用“敬语—卑称”，心理上产生尊卑之分。这种秩序井然的“类家族”文化在职场中同样存在。韩国企业曾经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职员以企业为家。20世纪90年代末，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韩国不得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启用弹性雇佣制度，但强调忠诚、奉献、团结的企业文化尚未消失。今天，韩国人在下班后仍要投入大量时间维护与同事的情感纽带，以营造亲密的共同体氛围，韩国企业的人事制度也尚未摆脱“年功序列”的传统。

（二）未曾经历文化冲突的单一文化族群国家

在古代朝鲜所处的中华文化圈里，未出现由宗教引发的大规模冲突。在这一地区，文化不是族群间的藩篱，而是凝聚认同的媒介。在中华文化的视野中，

① 최상진, 『한국인 심리학』, 중앙대학교 출판부, 2000, pp.123-127.

② 상동, p.203.

③ 왕효령, “한국과 중국 대학생의 유교 가치관에 대한 비교연구”, 경희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02, pp.36-37.

某个族群在未接受先进文化时是蛮夷，学习先进文化后就是中华。根据这一逻辑，朝鲜、日本都曾经自称中华。中华文化主张“不往教”“修德以来远人”。古代朝鲜曾一度是华夷秩序的积极的自觉的拥护者。明清鼎革后，朝鲜还曾沿用明的年号、衣冠，自称“小中华”。朝鲜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之深，这一地区族群间文化融合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初，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被殖民的历史激发了一种具有强烈反抗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民族话语，“单一民族”就属于这种话语。日本二战投降后，李承晚在美军的扶植下建立大韩民国，建国伊始就积极宣传“一民主义”。朴正熙政府也通过“纯粹的白衣民族”等话语塑造民族自豪感。这种理念深入韩国民心。今天的韩国尽管面临人口迅速萎缩的危机，也没有出台系统性的移民相关法律，针对生活在韩国的外国人采取或排挤、或同化、或包容的政策，且排挤与同化多于包容。^②2022年，在韩滞留外国人约225万，仅占韩国人口的3.3%。其中，“海外同胞”约78万，结婚移民者约17万，这两类人都容易融入韩国文化。持工作签证的外国人只有45万。其余的则是“非法滞留者”，一经发现将被遣送回国。^③

三、政治家构建的身份政治

韩国的文化土壤里并没有身份政治的种子。然而，实现民主化转型后，政治家们在选举过程中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身份政治集团——“情理阵营”。“情理阵营”起初是相互对峙的两大寡头政党的选举工具，但随后发展成为跨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文化部落”，使韩国的政治龟裂向社会文化领域延伸。

（一）政治家构建的三种“情理阵营”

实现民主化转型后，韩国政治家们在选举过程中通过煽动怨恨情绪构建出身份政治集团。这种身份政治集团具有先共情、后共理（政治理念）的特点，最初以选举阵营的形式出现，笔者因此称之为“情理阵营”。韩国依次出现了基于地域、世代和性别的三种“情理阵营”。

① 왕효령, “한국과 중국 대학생의 유교 가치관에 대한 비교연구”, 경희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02, p.38.

② 崔佑吉、郑信哲：《韩国的外国人政策及社会整合问题》，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第1页。

③ 相关数据参见韩国出入境管理局网站，<https://www.moj.go.kr/moj/2412/subview.do>。

“地域情理阵营”形成于民主化转型过程中。1987年的总统选举标志着韩国民主化转型的开始。在这次选举中，曾经主导民主化运动的金大中和金泳三得以与军政府出身的卢泰愚展开竞争。金大中和金泳三的家乡分别属于湖南地区和岭南地区，这两个地区的选民都选择支持他们的同乡。“同乡票”在这次选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导致民主化运动阵营分化，卢泰愚最终当选总统。卢泰愚当选后，为摆脱国会掣肘，与金泳三领导的政党结成政治同盟，孤立了金大中领导的政党，进一步加深了民主化阵营的分化。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金大中与金泳三再次展开争夺战，金大中的故乡湖南地区的选民在“背叛”“复仇”等话语的鼓舞下空前团结，将91%的选票投给了金大中。岭南地区受此影响，将68.8%的选票投给了金泳三。^①在紧随其后的国会选举中，二人领导的两个政党也分别在他们各自的故乡获得高比例支持。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政党格局逐渐呈现进步派和保守派两大寡头政党对峙的局面。金大中领导的政党成为进步派政党，以民主化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对内较为关心弱势群体，对外主张民族自决，提出了对朝“阳光政策”。随着韩国法院对全斗焕、卢泰愚镇压民主化运动、贪污腐败的行为展开审判，曾经在民主化运动中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湖南光州被塑造成民主化运动的圣地，在民主化运动中屡遭迫害的金大中被称为“忍冬草”，“进步派政党”“金大中”“湖南人”一同被贴上了民主斗士和受害者的标签。与之相对的，保守派政党则把岭南地区作为政治故乡。这里在军政府时期曾经走出多位总统，也是重要的重工业基地，被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聚集地。此后，湖南与岭南民众对同乡政治家的认同逐渐转变为对政党的认同。在岭南地区选出的议员中，保守派政党党员长期占多数。同样，在湖南地区选出的议员中，进步派政党党员长期占多数。^②回顾自民主化转型以来湖南和岭南选民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情况可见，湖南选民长期偏向支持民主派政党候选人，岭南选民长期偏向支持保守派政党候选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出生于岭南地区的卢武铉反而成为进步派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在进步派政党的政治故乡湖南地区得到了高比例支持。这标

① 王菲易：《韩国地域投票现象的历史变迁：以总统选举为例》，载《当代韩国》2010年春季号，第24页。

② 以202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为例。岭南地区选出的65名国会议员中有56人出自保守派政党，而湖南地区选出的28名国会议员中有27名出自进步派政党。

标志着湖南与岭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文化空间，两个地区与两大政党之间的链接已经超越了“同乡情”，变成了对政治理念以及特定政党的认同（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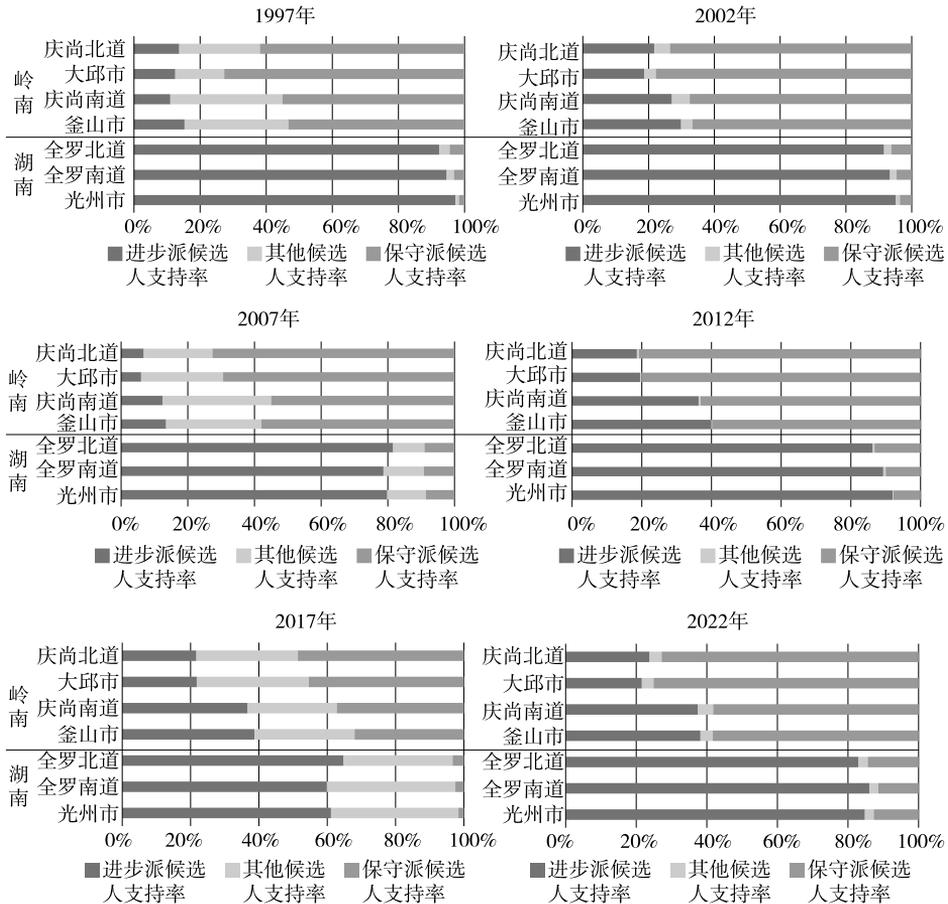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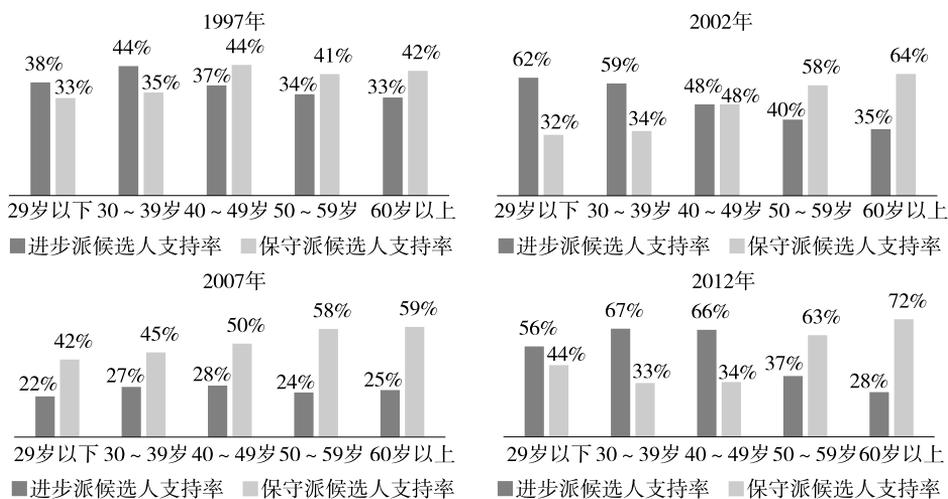


图 1 1997~2022 年韩国总统选举中湖南与岭南选民的立场差异

说明：进步与保守政党的理念对峙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趋于成熟，因此选取 1997 年以来的总统选举选票分布情况进行展示，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自制。其中，1997 年的数据来自盖洛普（Gallup）公司的选举调查结果，其他数据来自韩国三大电视台 KBS、SBS、MBC 联合举行的总统选举出口民调结果，参见韩国选举管理委员会相关年度数据，<https://www.nesdc.go.kr/portal/bbs/B0000005/list.do?menuNo=200467>

“世代^①情理阵营”产生于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最初的构建者是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卢武铉。“世代情理阵营”中的两大对峙人群分别是工业化世代和民主化世代。工业化世代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目睹了战后美国对韩国的援助，被大量反共教育洗脑，经历了20世纪后半期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民主化世代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参与或目睹了民主化运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民主参与意识和民族自决意愿。这两个世代原本不具有明确的政党偏向性。2002年总统选举前夕，一名驻韩美军轧死了两名韩国中学生，引发了大规模反美游行示威。进步派政党候选人卢武铉在示威人群中喊出了“反美又如何”的口号，赢得了民主化世代的支持。卢武铉当选总统后遭保守派弹劾，民主化世代发起反弹劾示威，并在紧随其后的国会选举中高比例支持进步派政党。这些现象被媒体称作“年轻人的叛乱”以及“世代之战”。有了之前“地域情理阵营”的经验，两大政党很快分别与上述两个世代建立起了情感共鸣，并以其代言人自居。自此之后，民主化世代和工业化世代分别成为进步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的稳定支持者（见图2）。



① “世代”指在青少年时期共同经历了某些历史、文化事件的一代人。青少年时期的共同经历会让一代人拥有相似的意识结构和行为方式，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同质性。具体含义参见 Karl Mannheim,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8, pp. 286-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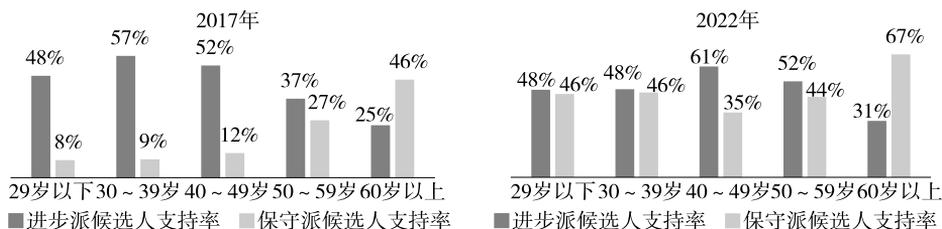


图2 1997~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中不同年龄层的立场差异

说明：2022年的“29岁以下”人群指18~29岁的选民，其余年度的“29岁以下”人群指19~29岁的选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自制。其中，1997年数据来自盖洛普公司选举调查结果，其他数据来自韩国三大电视台KBS、SBS、MBC联合举行的总统选举出口民调结果，参见韩国选举管理委员会相关年度数据，<https://www.nesdc.go.kr/portal/bbs/B0000005/list.do?menuNo=200467>

“性别情理阵营”形成于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是由保守派政治家李俊锡、尹锡悦等人构建的。相互对峙的两个“性别情理阵营”分别由青年男性和女性构成。相比之前的两个“情理阵营”，“性别情理阵营”的构建表现出更明显的策略性。两性平等是韩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以来长期存在的议题。进入21世纪，韩国年轻人围绕两性平等和女性主义思想开始出现意见对立。2010年前后，互联网上出现了“嫌女”论坛与“嫌男”论坛相互攻击的现象。^①2016年，一名男性因憎恶女性而随机杀害了一名女性，引发了大规模悼念和示威活动。2018年，为了谴责警察在执法中偏袒男性，^②首尔又发生了6次女性示威集会，参加者达到36万人次。^③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空间，两性平等话题已经取代就业话题，成为年轻人最关注

① 2001年，釜山大学学生论坛“越墙”批评退伍男生将不健康的军队文化带入大学校园，网站因此遭到网络攻击。以此为发端，很多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网站和论坛遭到攻击。2009年，一名女性在电视节目中称矮个子男生是“Loser”。在此之前，韩国男性经常评价女性容貌，但女性公开评论男性容貌的现象很少见。该名女性因此遭到互联网暴力和人身攻击。这一事件后，很多女性论坛开展“镜子运动”，把互联网上常见的嘲讽女性话语置换为嘲讽男性话语，从此出现了“嫌女”与“嫌男”言论对峙。

② 一名女学生因为将男性人体模特裸照发布到互联网上而被捕。一些女性网站认为，面对类似案件，当受害人是女性时警察执法拖沓，而当受害人是男性时警察行动迅速，存在偏向性执法现象。

③ 김남미외, “여협-남협 갈등: 온라인 커뮤니티를 중심으로”, 정치·정보연구, 2019, 제22권 제3호, pp.36-37.

的社会问题。^①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社会矛盾虽然激化，但在最初的十多年里主要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存在。文在寅在 2017 年选举中因为亲女性主义的形象得到了女性选民的好感，但当时并未出现年轻男女的阵营化现象。年轻男女的阵营化现象出现在 2022 年大选前夕，起因是 2020 年韩国修改《选举法》，将选民年龄由 19 岁下调至 18 岁，各政党开始更加积极地争取年轻选民。在年轻人中支持率较低的保守派政党国民力量党任用 36 岁的李俊锡为党代表，李俊锡策略性地批判女性主义，煽动年轻男性的受害意识。而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则在竞选中称韩国已经不存在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两性平等政策违背了能力主义和自由竞争原则。尹锡悦声称当选后要解散女性家庭部，将性别认知预算改为国防预算，^②针对职场性骚扰诉讼设立诬告罪，取消雇佣中的性别配额等。在尹锡悦成功获得年轻男性的支持后，进步派政党候选人李在明则主动与女性主义团体靠近。2022 年的选举结果显示，18~29 岁男性中，支持尹锡悦的占 58.7%，支持李在明的占 36.3%。18~29 岁的女性中，支持尹锡悦的占 33.8%，支持李在明的占 58.0%。在 18~39 岁选民中，60% 的男性支持尹锡悦，60% 的女性支持李在明。年轻男性对保守派政治家的偏爱与年轻女性对进步派政治家的偏爱旗鼓相当，而其他年龄层中不存在这种男女间立场对峙现象，由此可见，年轻人在政治家的鼓动下形成了“性别情理阵营”（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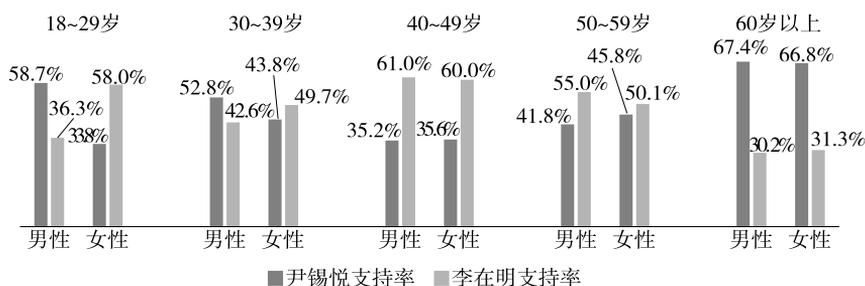


图 3 2022 年韩国总统选举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别选民的选票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三大电视台 KBS、SBS、MBC 联合举行的总统选举出口民调结果自制，参见“2022 대선 성별·연령별 출구조사 결과”，연합뉴스 2022.3.9，<https://www.yna.co.kr/view/GYH20220309000900044>

① 정성조, “‘청년세대’ 담론의 비관적 재구성: 젠더와 섹슈얼리티를 중심으로”, 《경제와 사회》, 2019, 통권 제 123 호, pp.12-39.

② 韩国相关法律要求政府在设立预算时考虑对两性的不同影响，并将这种体现两性均衡发展意识的预算称为“性别认知预算”。

(二) 作为强大选举工具的“情理阵营”

韩国的保守派政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是大资本的代言人。进步派政党虽然也拥护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但相较保守派，在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等分配问题上态度更加积极。在保守和进步两大寡头政党之外，韩国还存在左翼政党。左翼政党与工会联系紧密，主张以更加严厉的政策遏制财阀垄断，并对社会财富进行均衡分配。但是韩国学者研究发现，选民的政党偏好与其阶层利益不符。首先，左翼政党得到的支持率很低。以 2022 年总统选举为例，左翼政党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正义党候选人，其得票率仅有 2.37%。^①其次，高收入人群往往更加支持强调分配的进步派政党，而最贫穷的韩国人偏向支持保守派政党。韩国学者称这种选民投票与其经济利益不符的现象为“阶层背叛”，福山称之为“错误的地址”，^②是典型的身份政治现象。“情理阵营”正是造成“阶层背叛”现象的直接原因。

图 1 至图 3 分别展示了三种“情理阵营”对选票分布所产生的稳定影响。随着“情理阵营”的增加，受“情理阵营”影响的选民日益增多，韩国选举日益脱离经济理性，经济分配议题被日益淡化。首尔大学和平统一研究院针对 2012 年、2017 年和 2022 年的总统选举结果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影响选举结果的最重要变量是政党认同感，其次是对朝政策立场，而阶层相关变量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较微弱，且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在 2012 年的选举中，选民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还曾对投票结果产生较弱影响，然而在 2017 年和 2022 年的选举中，无论是选民自身的阶层属性，还是选民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都不再对投票结果产生影响。^③2022 年的选举结果显示，月收入 300 万韩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倾向于支持最不能代表其经济利益诉求的保守政党候选人，月收入 600 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倾向于支持进步政党候选人（见图 4）。

① “2022 대선 국민의 선택”, SBS 뉴스, 2022.3.9, <https://news.sbs.co.kr/election2022/main.do>.

②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 75~80 页。

③ 서울대학교 평화통일 연구원, 통일외식조사 2022, pp.191-192.https://ipus.snu.ac.kr/blog/archives/research_cat/unification_perception-surv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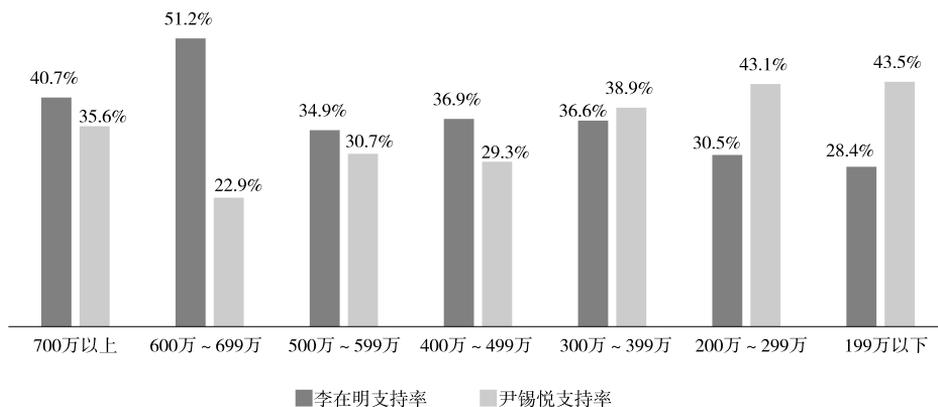


图 4 2022 年韩国总统选举中不同收入水平者的投票意向

说明：图中所示收入为家庭平均月收入，单位为韩元

资料来源：参见이재욱, “20 대 대선 유권자들의 이념적 구성과 대선후보 선호도: 세대균열, 계급배반, 그리고 양극화”, EAI 이슈브리핑, 2022 년 1 월 28 일 <https://www.eai.or.kr>

(三) 从政治龟裂向社会文化龟裂的延伸

政治家们引导了“情理阵营”话语的构建。话语构建一旦开始，选举专家、学者、媒体等各种声音都会参与其中，无论是批评还是解释，客观上都会对“情理阵营”话语进行再生产。“情理阵营”话语一旦形成，其影响力便不再局限于选举，也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在“情理阵营”的影响下，韩国社会出现了以某种情感共鸣、文化认同、利益认同为基础的“文化部落”。“情理阵营”把二元对峙的政治格局复制到了社会文化系统中。

“地域情理阵营”话语对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包括交友、恋爱、婚姻和商业合作等行为都产生了影响，在强化岭南和湖南地区民众内部认同的同时，在这两个地域间制造了心理隔阂。在“地域情理阵营”形成过程中，韩国学者对岭南与湖南之间的心理对抗进行了历史归因，称湖南地区自古以来处于权力边缘，因此该地区的文化长久以来带有明显的受害意识。^①这种因果关系的真实性难以被证实，却成为韩国人的普遍认知。这种话语逐步造成了湖南人与岭南人性格迥异，乃至难以合作的刻板印象。同乡情原本只有远近之分，心理空间呈界限模糊的同心圆结构，“地域情理阵营”却把这种

① 영민, 『대한민국 정치사: 민주주의의 도입, 좌절, 부활』, 일조각, 2013 년, p.275.

同心圆转化为有着明确边界的条块。

用于塑造“世代情理阵营”的话语则同时强化了世代间的文化差异和社会资源竞争意识。2002年以后,媒体和学术界出现了世代话语热。企业在营销过程中热衷于以世代为单位研究消费者文化,同时也给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贴上世代标签,并向目标人群灌输。政治家们热衷于讨论世代之间的各种资源分配不公正现象,把这一视角引入雇佣政策、房地产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议题。例如,面对工会罢工,朴槿惠就曾煽动世代间矛盾,称“年长世代是既得利益者,应该(向年轻人)让步”。^①有关老年人是否应该免费乘坐交通工具、是否应该向老年人无差别发放养老金的争论经常出现在选举论战中。而在20~40岁人群占据舆论主导权的社交媒体上,声称年轻人被年长世代剥削的声音非常常见。年轻人指责年长世代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分享了经济增长的红利,获得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却还不断举行罢工要求更好的工资待遇;指责他们享受了低房价时代的红利,却又通过收房租剥削年轻人;指责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只能供养目前的年长者,年轻人将来却要面临养老金枯竭的困境。“世代战”话语渗透至公共政策领域,将贫富分化问题曲解为世代间的资源争夺问题。

两性间的冲突虽然先于“性别情理阵营”而存在,但“性别情理阵营”的出现使两性冲突意识形态化,使相关政策的协商出台更加困难。在2022年的选举过程中,那些原已达成共识的、已经开始实施的、旨在推动两性平等发展的政策和法规被重新质疑,批评女性主义的声音因为有了政治理念的支撑而放大了音量。尹锡悦在当选总统后,没有像他在选举中所承诺的那样取消两性平等相关法规,但在支持率下滑时多次重提修改相关法规,旨在借此重新获得年轻男性的支持。尹锡悦的这种做法反复激化两性间的情感对峙,固化了两性间的文化壁垒。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成为重要的选举工具,“情理阵营”与互联网文化融合,把“文化部落”拓展到了网络空间。近年来,年轻人把“饭圈”^②文化引入

① “박대통령 ‘노동개혁은 일자리, 기성세대 기득권 양보해야’”, 온마이뉴스, 2015.8.6, https://www.ohmynews.com/NWS_Web/View/at_pg.aspx?CNTN_CD=A000213354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年长者与年轻人是相对意义的概念,年长者并不必然是老年人,根据语境,本文同时使用这两种说法。

② “饭”即“粉丝(fans)”。饭圈文化是粉丝文化伴随着互联网对文娱产业的介入和偶像工业生态改变所发展出的新样态,是粉丝群体以网络社交平台为主要空间,围绕特定明星所展开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特定的圈层传播模式和群体内部的运作机制。参见胡泳、刘纯懿:《现实之镜:饭圈文化背后的社会症候》,载《新闻大学》2021年第8期,第65~79页。

互联网选举活动。有韩国学者针对“文在寅饭圈”展开研究发现，“饭圈”中的年轻人把文在寅视为自己参与塑造的“明星”，关注其活动轨迹、日常生活，积极为其拉票，与之互动，与竞选对手的“粉丝群”展开口水战，甚至打电话辱骂竞争对手。^①年轻人通过政治家“饭圈”活动找到了参与重大事件的路径，政治家具有了与娱乐明星相似的消费价值。

在“情理阵营”不断发展的同时，韩国社会的龟裂与对抗现象亦随之增加。有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韩国人围绕政治话题的分歧在增大。^②2017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在各种社会议题中，韩国人的立场大多呈现保守与进步对抗的局面。^③在韩国街头，持相反意见人群同时举行抗议示威的现象越来越多。例如，2014年“世越号”游船沉没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要求政府就事件真相展开进一步调查，为此进行街头绝食斗争，而政府的支持人群就在相同场所进行“暴食暴饮示威”。朴槿惠“闺蜜门”事件爆发后，首尔街头多次出现烛光游行示威，要求弹劾朴槿惠，而支持朴槿惠的保守阵营民众则举行了反对烛光游行的太极旗游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青瓦台网站的意见栏上出现了要求弹劾总统的请愿文，超过140万韩国人在一个月内在此请愿文后署名表示支持。而相同时间里，反对弹劾的署名者也接近100万。^④2022年首尔梨泰院踩踏事件发生后，遇难者家属举行示威游行谴责警察和政府的应对迟缓，而支持政府的保守派民众则在灵堂附近进行批评遇难者家属的示威活动。

四、被动接受的身份政治

韩国社会对政治家引导“情理阵营”话语构建的行为持批判态度，并为阻止其发展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理性与

① 조은혜, “‘정치 팬덤’ 현상과 네트워크 기반 시민정치참여: 문재인 대통령 지지자를 중심으로”, 중앙대학교 사회학 석사학위 논문, 2021년.

② 정한울, “한국인이 보는 사회갈등구조의 변화와 정치·이념 양극화의 실상”, EAI 위킹페이퍼, 2020.11.9, pp.30-31. <https://www.eai.or.kr>

③ 한국 보건사회연구원, 「사회통합 실태 진단 및 대응 방안 연구(V)-사회갈등과 사회통합」, p.142. <https://www.kihasa.re.kr/publish/report/view?type=all&seq=27935>

④ 王晓玲：《韩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举措及其启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69页。

道德在约束身份政治方面未能发挥作用。韩国社会之所以被动接受了“身份政治”，除了政治家引导全社会反复构建“情理阵营”之外，还有结构性的原因——长期影响韩国的冷战思维与财阀垄断的经济体制，导致选民在代议民主制度内部找不到心仪的代言人。

（一）韩国反“情理阵营”的努力及其失败

在“情理阵营”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韩国的思想界不断批评“情理阵营”扰乱选举、降低政治系统的效率、破坏韩国的民主制度、撕裂韩国社会。在韩国，批判“情理阵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在三个“情理阵营”中，“地域情理阵营”存在的时间最长，韩国人为消除“地域情理阵营”所做的努力也最多。学者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认为“地域情理阵营”现象是前现代农业社会文化的残留，是民主文化发展不成熟的表现。^①在2000年的国会选举中，460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落选运动”，对存在贪污、收受政治献金、贿选以及煽动“地域主义”行为的候选人进行曝光，被曝光的86名候选人中有59人落选。^②为了打破“地域情理阵营”，身为进步派代表的卢武铉特意在保守派的政治故乡釜山市参选国会议员，并因此建立起“新一代政治家”的积极形象。为抑制“地域情理阵营”现象，韩国数次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例如，2004年将国会议员的选举投票由“一人一票制”改为“一人两票制”，2020年又出台“准联动比例代表制”，^③目的均在于弱化“地域主义选举”。然而，上述努力对“地域情理阵营”的遏制效果非常有限，“地域情理阵营”持续影响选票分布，卢武铉深入对方阵营的竞选挑战也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韩国选民虽批判“地域情理阵营”，但在投票时却依然受其影响。

社会舆论以及学者们对“世代情理阵营”进行了大量批判。他们批评“世代情理阵营”不但破坏了家庭和睦，还激化了社会矛盾。韩国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反复强调，“世代战”是政党煽动下形成的错误认知，年轻人的

① 김정, “한국 유권자의 당파 분열과 당파 정렬: 2012년 및 2022년 대통령 선거 비교”, EAI 위킹페이퍼, 2022.5.18, pp.5-6; 장승진, 서정규, “당파적 양극화의 이원적 구조: 정치적 정체성, 정책 선호, 그리고 정치적 세련도”, 한국정당학회보, 2019.9, pp.5-29.

② 房宁等:《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151页。

③ 韩献栋:《地区主义、选举制改革与第二十一届韩国国会选举》,载《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第81页。

经济困境是收入两极分化加剧的结果，所谓的机会不平等存在于阶层之间而非世代之间。^①但是，政治家们持续不断地刺激世代间的对立情绪，围绕雇佣政策、福利政策、房地产政策甚至环境问题挑拨世代间矛盾，把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争夺社会资源的零和关系。以 2022 年的总统竞选为例。尹锡悦提出“世代包围论”，即以“工业化世代”的支持为基础，争取 2030 世代的支持，从而对“民主化世代”形成“包围”。李在明则提出“世代突围论”，号召“民主化世代”说服身边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选举结果证明，理性声音不敌政治家的煽动。

韩国选民们越来越清楚政治家刻意塑造“情理阵营”的做法。在 2022 年的总统选举中，韩国的媒体和选民马上意识到保守派政治家在策略性地利用和煽动两性间相互嫌恶的情绪，故意将女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化。女性主义团体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激烈批判。部分年轻男性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政治家们将两性平等问题意识形态化。但是，上述理性声音未能阻止“性别情理阵营”的形成。

（二）阻断经济分配诉求的政治经济结构

韩国人找不到真正专注于分配议题的政党为自己代言，这是由韩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

首先，冷战秩序阻碍了关注经济分配的左翼政党的发展，致使经济分配议题在韩国政治中没有真正的代言人。冷战时期，韩国处于两大阵营对抗的最前沿，政府积极开展反共教育，压制工会发展。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是韩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井喷期，也是左翼政党的发展机遇期。1987 年，韩国发生了 3749 起工会领导的罢工事件，比过去 25 年的总和还多。从 1987 年到 1989 年，工会组织由 2700 多个增加到 7800 多个。^②但当时，工人自建的工会还得不到法律承认，工会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韩国人在工厂和街头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同时，却在总统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了同乡。2000 年，韩国才出现以工会为基础的左翼政党民主劳动党。当时的韩国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民众对于雇佣稳定、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关注度陡升，对财阀体制的批判也到达了新高潮。但是，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国家保安法》仍然限制着工会与

^① 可参见신진욱, 「그런 세대는 없다」, 개마고원, 2022 년 2 월.

^② 王晓玲:《韩国劳资关系:从对抗走向协商》,载《当代亚太》2009 年第 4 期,第 143~144 页.

政党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不断恶化的朝核问题始终阻碍民主劳动党的发展。工会政党的发展机遇期转瞬即逝。进入 21 世纪，资本与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加速、就业竞争加剧，工会在劳资斗争中的话语权减弱。雇佣形态的多样化不断分裂劳动者，削弱了工会的号召力。民主劳动党仅在 2004 年和 2008 年的国会选举中分别获得了 10 个和 5 个议席，无法与动辄拥有 100 多议席的两大寡头政党匹敌。^① 社会基础日益萎缩的民主劳动党最终在 2011 年与其他左翼政党合并。后来成立的韩国左翼政党力量依旧薄弱，也并不把经济分配作为最主要的政治纲领。

其次，财阀垄断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叠加，不断弱化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致使选民对选举中的经济议题逐渐失去兴趣。财阀垄断和外向型经济是韩国经济的两个基本特点。2021 年，十大财阀企业的销售额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58.3%，^② 财阀对国内市场的投资、技术升级、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股市走向、景气指数以及外贸出口影响巨大，广泛涉足媒体和金融产业，通过“旋转门”间接影响政府和司法机构，通过支付广告费和捐款等途径间接影响媒体、高校、研究所和市民团体。^③ 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升了财阀的全球竞争力，韩国国内消费市场却持续低迷，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政府既无力改善财阀垄断的经济结构，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和对就业的刺激措施也难见成效，很多政策的实施还有赖于财阀的积极配合。例如，卢武铉政府为增强雇佣稳定性，曾出台《非正规职保护法》，规定企业雇佣“非正规职”达到一定年限后必须将其转化为正规职。^④ 该政策发布后，企业却选择在规定期满前与劳动者中止劳动合同加以应对，《非正规职保护法》成为“非正规职解雇法”。

韩国民众在选举中找不到心仪的代言人，只能满足于通过参与选举活动发泄不满情绪，从投票活动中甚至“政治家饭圈”活动中获得个人价值感。因此，韩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选民厌恶候选人却积极参加投票。自 1987 年

① 参见韩国选举管理委员会相关年度数据，<https://www.nesdc.go.kr/portal/bbs/B0000005/list.do?menuNo=200467>。

② 박상인, 『지속불가능 대한민국』, 21 세기 북스, 2022, p.9.

③ 房宁等：《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第 149~154 页。

④ “비정규직 보호법, 왜 논란인가?”, KBS 뉴스, 2007.7.1, <https://news.kbs.co.kr/news/pc/view/view.do?ned=1382590>。

开始民主化转型至今，韩国的总统投票率除 2007 年之外都在 70% 以上。2000 年后总统选举投票率曾经一度下滑，但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随着政治极化现象日益凸显，投票率再度上升。^① 2022 年的总统选举中，46.7% 的韩国选民认为这次选举最严重的问题是“候选人的道德与资质欠缺”，23.8% 的受访者认为这次选举最严重的问题是“候选人不进行政策讨论只热衷于爆对方黑料”。在投票给尹锡悦和李在明的选民中，49.3% 的选民对自己选择的候选人感到“不满意”，但这并不妨碍二人各得到了 48.6% 和 47.8% 的选票。^②

五、总结与思考

（一）走向非理性对抗的韩国身份政治

韩国身份政治是政治家通过话语构建而成的，最初是选举工具，后来发展成跨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文化部落”。“情理阵营”的选票动员力如此强大，政治家们难以放弃，必定持续进行相关话语构建。冷战思维与财阀经济垄断深刻嵌入韩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中，难以改变。这两种结构的存在使得韩国人在代议民主制度内难以找到专注于推动经济分配的代言人，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们被动地接受身份政治，满足于身份政治提供的情感价值。因此，尽管韩国社会对身份政治的反思从未停止，韩国还是在身份政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条道路上，危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系统之间相互转换并不断积累，政府治理能力难以满足国民需求，政党间对抗日趋白热化，全社会的受害意识、怨恨情绪不断滋长，协商与妥协变得愈加困难。特别是朴槿惠被弹劾下台后，两大阵营的情感对峙被进一步激化。政治家们纷纷放弃稳健形象，许下难以兑现的政治承诺，炒作具有社会争议的话题，试探已经形成共识的“政治正确”。^③ 与此同时，政治两极对抗与社会撕裂正形成共振。

^① 1987 年到 2022 年的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依次为 89.2%、81.9%、80.7%、70.8%、63%、75.8%、77.2%、77.1%，参见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相关统计，http://info.nec.go.kr/main/main_previous_load.xhtml。

^② “‘육설’ ‘열집’ ‘줄리’ ‘늑취’ …역대급 네거티브 선거, 고소 고발 120 건”, TV 조선뉴스, 2022.3.8, http://news.tv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22/03/08/2022030890132.html。

^③ 刘荣荣、王付东：《韩国政局动荡的特点、动因及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1 期，第 24~31 页。

韩国的这种对抗性身份政治的破坏力势必向国际社会外溢,表现为在其外交中进一步远离理性思维和实用主义,受制于偏激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民族主义情绪。这种不理性对中韩关系的影响已经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青瓦台网页上一份题为“文在寅是中国总统”的留言贴迅速点燃了反华情绪,因疫情陷入生活困境的部分韩国人以中国为对象发泄负面情绪,与在韩国人有关的负面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泛滥,街头也出现了反华游行示威。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中韩合作开发的观光项目被叫停。在202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都出现了候选人无视中韩之间巨大的经贸合作利益,利用和煽动反华舆论的现象。一些韩国学者指出,这种非理性的反华现象不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并对这种脱离实用主义的现象表示担忧。^①但就目前韩国的政治生态来看,反华恐将反复成为政治家们在选举中博取眼球的话题,成为韩国社会怨恨的发泄口之一。

(二) 引发身份政治对抗的是文化吗?

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论把“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视为身份政治的原初动力,把族裔、宗教等先天或半先天的文化差异视为身份政治对抗的起因,在文化差异和身份政治对抗之间画了一条因果链。而韩国有着不同于欧美的历史文化土壤。如果说欧美社会在共同体意志与个人自由之间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后走向了身份政治,那么在韩国,共同体意志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韩国社会并不鼓励个人自由主义,其社会文化心理中也不存在“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韩国历史上未经历因文化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今天仍以单一民族国家为荣。福山曾对朝鲜半岛以及中国、日本拥有发展完好的民族身份表达羡慕,他认为,民族凝聚力以及精英们为国奉献的情怀推动了这些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快速发展。^②然而福山没有发现,随着以选举为中心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在韩国运行,韩国也出现了身份政治集团。政治家在单一文化族群内部构建了“文化部落”,同时把政党间的对抗输入社会文化系统。韩国的案例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文化可能仅仅是一个中间变量,导致身份政治冲突的自变量其实是竞争性政党。文化导致冲突的这一因果关系或许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韩国的案例提醒我们,在身份政治研究中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김희교, 『쟁개주의의 탄생』, 브리, 2022년 4월.

②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122~126页。

至少要同时关注文化差异、政党竞争模式以及关注经济分配的政党的影响力这三个自变量。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还支持了阿玛蒂亚·森的判断——政治实践如此复杂，文化冲突论或者文明冲突论这种简单抽象的概括本身不符合事实，却被构建成话语，被政治权力所利用，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我们把竞争性政党视为身份政治的主体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反思还是政府都难以完成统合多元文化族群的任务。左翼哲学家们从“主体间性”概念出发，相信现代社会的理性会指引不同文化身份群体通过阐述各自需求的合理性，走向多元文化共存且相互尊重的政治共同体。福山等人希望政府能够积极统合文化族群，走向“信条国家”。这两种认识的出发点都是把文化族群视为冲突的主体。但如果政党也是身份政治的当事人，我们就会发现，竞争性政党之间是零和关系，彼此无法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政治授权与治理的不同步性使得政治家们把选票作为目的，宁可为此破坏社会团结。在大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力较弱，政党难以通过改善民生获得支持，转而从怨恨、分裂、对抗的身份政治中获取政治资源。欧美国家寄希望于政府承担起文化统合的责任，可能是南辕北辙。即便政党在执政后会为弥合文化族群间冲突做一些努力，但总体上竞争性政党是文化族群的离散力而不是凝聚力。

韩国的身份政治案例说明，文化差异引发身份政治斗争的论断缺乏普适性。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仅展示了韩国的经验，要厘清身份政治的动力机制，检验文化冲突论，应该在后续研究中开展更多的跨文化比较。例如，日本由自民党长期执政，不存在激烈的政党间竞争，也不存在多元文化族群。美国既存在两大政党长期对峙的现象，也存在多元文化族群矛盾。一些欧洲国家虽然存在多元文化族群间的矛盾，但政党竞争呈现多头局面。如果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党结构同时纳入自变量，对更多的国家进行案例比较，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身份政治的动力机制，重新认识导致文化族群走向身份政治冲突的力量。

With the rise of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ecline of its hegemony, networked sanctions, whose main feature is cutting off network connections, have become the main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maintain its hegemony.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ory,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networked sanctions to maintain hegemony, and examines from a theoretical level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by which networked sanctions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network systems and thus affect networked power. Case studies of the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theory above; in the long run, spirally escalating sanctions will continue to destroy the network structu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 through the self-strengthening-weakening mechanism of power.

Key Words: Network Power;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 Networked Sanctions

About the Authors: Mi Jun is 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ichuan University; Tao Huan (Contacting author) is a MA Student in the 2021 class at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ichuan University; Lan Di is a MA Student in the 2022 Class at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ichuan University

Do Cultural Differences Result in Conflicts in Identity Politics? Trends in South Korean Identity Politics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Wang Xiaoling

Abstract: Existing theories of identity politics largely reflect Western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ories of identity politics establish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in identity politics. Despite being a homogenous society, South Korea has nonetheless experienced conflicts in identity politics. South Korean politicians have fabricated a unique political identity group—the “loyal and righteous camp”, which initially served as an electoral tool, but which later evolved into a “cultural tribe” which spans both political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 While Korean society remains critical of the “loyal and righteous camp”, the electorate has passively accepted the identity politics in a society where no political parties exist to advocate for their economic interests because of a prevailing Cold War mentality and an economy dominated by corporate conglomerates. In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culture serves as an intermediate variable which results in conflict and the truly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ies. The South Korean case suggests that many theories of identity politics, including the cultural conflict theory, require further validation through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ies.

Key Words: Identity Politics; Cultural Conflict Theory; Homogenous

Cultural Group;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ies

About the Author: Wang Xiaoli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er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Tools for Responding to Anti-American Sentiment

Sun Chenghao and Yang Yimeng

Abstract: To achieve its global strategic objectives,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es a favorable foundation vis-à-vis public opinion and discourse. When considered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anti-American sentiment, systematic research on America's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is not yet availabl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wo key framing variables for analyzing America's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options for responding to or mitigating constantly shifting anti-American sentiment on a global level: the status quo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urgency of anti-American sentiment. Specifically, it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which characterize the status quo vis-à-vis bilateral relations: "found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strategic values" and "American intentions," and that America will adopt a strategic response around these dimensions. The article selects a series of typical cases under a range of different contexts to illustrate America's public foreign diplomacy choices and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y are implemented.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fer an important point of reference for other states practice of public foreign diplomacy and efforts to improve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Anti-American Sentiment;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Bilateral Relations; Public Opinion; National Image

About the Authors: Sun Chenghao is an Assistant Fellow a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Yang Yimeng is a Youth Fellow of the U. S. -Europe Program a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U. S. Perceptive Biases, Threat Amplification, and Policy Choices on Chin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Based on an Analytical Eclecticism Approach

Cui Zheng Yin Jincan

Abstract: In the stag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misunderstands China's AI development goals, magnifies the threat of China's AI development, and then breaks through the reasonable range, forming a multilayered perceptive bias towards China's AI, which affects the formulation of U. 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ies towards China,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 S. -China relatio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the